



Towards a Highly Educated Socie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迈向教育 高度发达的社会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高等教育体系

〔德〕乌尔里希·泰希勒 / 著
肖 念 王绽蕊 / 主译



科学出版社



迈向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高等教育体系



〔德〕乌尔里希·泰希勒 / 著
肖 念 王绽蕊 / 主译

科学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多样化与同质化、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及其发展趋势,分析了高等教育体系变革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系及其对工作世界的影响,描绘了经由高等教育体系变革达到教育高度发达社会的路径。

本书是乌尔里希·泰希勒教授数十年来对高等教育体系深入研究的思想结晶,适合高等教育研究者、决策者、对高等教育体系变革问题感兴趣的研究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向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国际比较视野下的高等教育体系/(德)泰希勒(Teichler, U.)著;肖念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2
书名原文: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SBN 978-7-03-039678-5

I. ①迈… II. ①泰… ②…肖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体系—比较教育—世界—文集 IV. ①G64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9105 号

责任编辑:汪旭婷 乔艳茹 高丽丽 / 责任校对:张小霞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楠竹文化

编辑部电话:010-64033934

E-mail: fuyan@mail.sciencep.com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杰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2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4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插页:2

字数:350 000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文版序

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正在形成？

——各国高等教育近普及化的缤纷历程

高等教育被视为一个彰显当代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领域，然而在大部分国家中，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并不是很多。以作者所处的国家——德国为例，在大学中，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人数所占比例在1‰到2‰之间。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将视野拓展到更为宽广的主题领域。

不仅如此，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大部分高等教育学者将更多目光投向国内，只是近些年来，学者们同时也愈发地关注本国以外的高等教育，随之而来的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出现和发展。我们尽力了解多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现状以及理论基础。

我有幸从事高等教育研究50年了。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荣幸地接到了一名教授的邀请，接触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我学生生涯的一半时间都参与到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当中——访谈调查、收集资料、分析数据等。毕业之后，我得以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Max-Planck Institute）从事了10年教育学研究，在那之后（即35岁之后），我成为一名教授并多年担任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之职。

我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自己的国家，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我曾定居日本、荷兰和美国，并在10个国家短期执教。此外我还访问过80多个国家。我之所以能够了解这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一方面是卡塞尔大学的青年学者和资深学者在科研领域努力进取、开拓创新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于我和同事们于1988年一道发起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组织网络——高等教育研究者协会（the Consortium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 CHER），并致力于本领域的比较研究。

我发表过的1000余种出版物大部分集中在以下四个主题领域：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体系比较研究、国际高等教育流动与合作、学术职业。我的研究也会涉及其他相关领域，如招生、评估、高等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角色等。我的研究问题由来已久：当社会中大学毕业生占到人口一半以上时，这个“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

在过去50年里，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提高了10倍以上，

这使得规模扩张成为高等教育领域长期以来最为强大的影响力量。

然而，很多国家决心作出不同的回应：他们选择了高等教育多样化之路，而不是因循一种模式。一些国家将高等院校分为教学科研并重型和教学型，另一些国家则运用其他正式的高等院校分类模式。在一些国家，高等院校纵向层次分明；在另一些国家，其层级差异则扁平得多。就高校内部结构而言，一些国家喜欢多样化一些，所以一校一面，多姿多彩；而在另一些国家，千校一面，最多只能保持适当的多样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各国的大学及其高等教育体系决不能屈从于那些不可避免的压力，去走同一条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之路，就像当前大家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行的争论中有些人建议的那样。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人们对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适应社会需求的期望也与日俱增，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成为雇主们亦步亦趋的随从，只去考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也不意味着它只需密切关注“知识经济”带来的研究需求。相反，正如我所建议的那样，高等教育必须让毕业生和研究者学会应对不可预知的、意料之外的任务。它所带来的唯一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时代变了：当今已是高等教育近普及化的时代，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要去做过去无需大学毕业就能做的工作。如果大学只是迫于社会压力就按照职业层级将学生和毕业生分为三六九等，必然致使“过度教育”的抱怨甚嚣尘上。相比之下，如果高等院校有先见之明，能主动出击，让学生学会驾驭工作、应对职位变化以及自我驱动，就会为工作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我所说的“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能应对变化、明智行动，从而使整个工作世界和社会更加民主化——也将成为现实。

这本书中的文章主要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体系，但是其他领域也会与这个主题紧密相联，如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张、高等教育和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原理和影响、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学生学习动机和态度、高等教育管理和政策、各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国际流动和角色的角色定位，等等。

在1986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就非常荣幸地被邀请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和专家邀请了六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在高等教育领域有学识的人。我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曾有机会访问过中国10次，并开始了解中国关于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前景的讨论。我过去仅用德文和英文进行高等教育领域的写作，但我的一些论文曾被译成20种语言，同时我的一些书籍曾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和日文。在这里，我还想对那些帮助我把这些文章翻译成中文并编辑成书的人，如北京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肖念、王绽蕊等人，以及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汪旭婷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乌尔里希·泰希勒
2013年6月

中译本序

泰希勒教授可以说是德国当今首屈一指的高等教育专家。他不仅是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创建者之一和领军人物，也是欧洲高等教育研究界的核心人物，曾任欧洲高等教育学会的主席，是欧洲科学院和教育国际科学院院士，长期在美国、日本的大学中担任客座教授，曾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颁发的夸美纽斯奖等重要荣誉。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界，可以说，无人不晓泰希勒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泰希勒教授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高等教育大家。

泰希勒教授是社会学出身，从柏林自由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位于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工作。该研究所建于1963年，是德国非常有影响力的教育研究机构。在当时的主任高特施密特（Dietrich Goldschmidt）教授的引导下，泰希勒开始关注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与职业问题。1978年，36岁的泰希勒被聘为卡塞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专门从事高等教育与职业的研究。在其后的40年中，泰希勒教授一直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和教学对象，而且从未离开过高等教育研究这个领域。他自己说过，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他的成果之多、研究之持久，世界上恐怕无人可比。有人粗略统计过，泰希勒教授每年平均工作3000小时，而一般人每年平均工作也就1800小时。在卡塞尔大学前3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共出差1600次，做报告1600次，发表学术论文和著作1000篇（本）。认识泰希勒教授的人都知道，他说话语速很快，工作有激情，效率高，成果丰富，可谓著作等身，也被同事们善意地称为工作狂。在他的领导下，卡塞尔大学的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不仅成为德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而且也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在德国，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受到高度重视，成立有若干专门的研究机构，比如，建于1969年的高等教育信息中心（HIS）、建于1973年的巴伐利亚州的高等教育研究与规划研究所（IHF）及1978年建立的卡塞尔大学的高等教育与职业研究中心（1992年更名为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INCHER-Kassel）。但是，高等教育研究在德国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少学科基础，即在大学中缺乏根基。高等教育的研究队伍分布在学术界、管理部门和咨询服务部门等，他们的研究兴趣不同，目标也多样。即使是大学中，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学科，许多人只是从特定的研究背景出发，或是阶段性地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缺乏一个稳定的、

成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圈。而在中国或者美国，高等教育是一个得到认可的学科，在大学中具有比较牢固的基础，拥有数量可观的高教育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特别是有庞大的专职研究人员和教师队伍。考虑到德国这种特殊的背景，泰希勒教授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其难能可贵。他在卡塞尔大学这个独特的高等教育研究平台上，还为德国乃至欧洲高等教育研究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比如，国际知名的荷兰特温特大学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HEPS）主任安德思（Jürgen Enders）教授和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前会长科姆（Barbara Kehm）教授都是在泰希勒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高等教育研究界的领军人物。

泰希勒教授在长达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结构以及高等教育教育国际化等方面。其中既有实证性的研究，他为德国及欧盟有关决策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和政策研究；也有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理论探索，比如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与职业的关系、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等问题的研究。本书在泰希勒的著述中有点特别，因为本书既是泰希勒教授不同时期研究的记录，也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基本思考线索的总结，是一本集中反映泰希勒教授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专著，非常值得推荐。

我与泰希勒教授也算是老朋友了。1987~1988年，我在柏林自由大学进修期间，遍访当时联邦德国所有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卡塞尔大学当然也在其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著名的泰希勒教授。10年之后，我申请到了一个欧盟的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项目，我选了泰希勒教授作为我的合作者。为此，我专门来到卡塞尔大学，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研究。在卡塞尔大学期间，我不仅进行我自己的研究，还结识了泰希勒教授的研究团队，参加了不少中心的工作会议及项目会议，以及一些学生研讨会，对泰希勒教授以及他所领导的研究中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此我与泰希勒教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并从他的学术研究与成果发表中受益匪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曾与泰希勒教授商谈过，准备选编一本泰希勒高等教育论文集，在中国翻译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计划。

我多年前的一个愿望，通过北京工业大学的肖念教授和王绽蕊副教授等人的辛勤翻译，终于得到了实现，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藉此可以一窥泰希勒教授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全貌，为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相信，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通过这本书，不仅可以更多地了解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可以促进我们反思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进而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陈洪捷

2013年7月于北京大学

译者序

社会中的高等教育体系

——乌尔里希·泰希勒的高等教育体系变革动力学解读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就是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它不仅给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也在改变着资源的组织方式、社会的价值体系，这些改变有时轰轰烈烈，有时悄无声息，非具有深刻洞察力不可察觉。

泰希勒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勤奋思考着的、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学者。他像一个将军，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的体系变革问题就是他厮杀的疆场。他的雄心并不局限于对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特征的描述和比较，而是试图去发现和解释这些问题之间的动力学原理和因果关系，并由此引出了另外两个主题，即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三者既是他长期笔耕不辍的研究领域，也是赋予“高等教育体系”这一研究课题以时代性和复杂性的两个重要维度。他取得了惊人的胜利：看似简单的高等教育体系问题，在他那里变成了立体和鲜活的话题。

一、扩张中的高等教育体系多样化

（一）高等教育体系研究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教育的核心功能是生产、保存和传播系统的知识，因此，在大多数人看来，如何更好地生产、保存和传播系统的知识，即教与学、研究和服务的方式方法才应该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议题和“分内之事”，高等教育体系研究和制度研究一样，是“表面问题”（本书 p. 1）。但泰希勒认为，这个表面问题也很重要。他列举了五个理由来论证这一课题的重要性，每一个理由都雄辩地说明，关注高等教育体系问题不仅仅是高等教育决策者、行动者、研究者的事情，也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因为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结构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它表明了一个社会在配置资源时的优先投入领域，

谁、有多少人能够接触到系统知识，选择任何一种体系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等。这些问题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既是短期的，又是长期的；既是整个社会的，又是与每个个体都息息相关的。那么，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难道还用怀疑么？

（二）高等教育体系的内涵

那么什么是高等教育体系？它和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能——教与学、科研和服务到底有什么关系？

“高等教育体系……通常情况下是指一个国家整体的数量结构特征。”（本书 p. 11）与我们通常强调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和层次不同，泰希勒大大扩展了“高等教育体系”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他看来，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涉及机构的类别和层次，也和高等教育的规模、内部组织等密切相关，高校学习项目的类型、学术质量、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关系等，都是高等教育体系分类的重要维度，因此对高等教育体系的研究也必须涉及对高校的教与学、科研和服务这些核心职能的研究。

高等教育的规模及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入学和招生、高校类型结构、学习项目的特征、高校之间的横向（如内部组织构造）或纵向（如质量、声望、排名）差异等，是泰希勒分析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以及这三个主题之间相互关联的主要单位。他相信，从对这些分析单位的观察、分析和比较中，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复杂的“动力学原理”。

（三）高等教育多样化

与高等教育扩张相伴的是高等教育数量结构的变化，由此产生了关于高等教育应该走向“多样化”还是“同质化”的争论，这也是泰希勒教授本书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泰希勒认为，对于高等教育多样化，人们无论是在概念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均未取得共识。在概念方面，有些衡量多样化的重要维度，例如内部组织机构、质量方面的横向多样化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他强调高等教育多样化不应仅仅指高等教育机构类型的多样化。与其对于高等教育体系内涵的界定相对应，泰希勒将多样性区分为“纵向多样性”和“横向多样性”，以表述高等教育体系的纵向差异（用质量层次、声望和选择性等来表示）和横向差异（用内部组织结构、概念化的“学术流派”等来表示）。

在实践中，人们在高等教育的纵向多样化程度方面并不存在着国际共识，对于横向多样化即学习项目和机构的实质内容，不同国家的鼓励程度也存在着

显著差异。“多样性之所以存在，也许是因为不存在一种能够迎合所有期望的高级模式。”（本书 p. 124）知识社会的发展强化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动机，人们的天赋才能、愿望和工作世界提出的新要求等要求高等教育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此外，影响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因素也在日益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全球化、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欧洲高等教育治理新模式以及知识社会的发展等，使得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发展过程日益复杂，对它的解释也需要更加宽阔的学术视野。

影响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动力学原理十分复杂，例如：入学人数规模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多样性的增加；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有直接影响，表现在“实行严厉管制的体系中高等院校向上流动是集体行为，而在管制没有那么严厉的体系中就是单个机构在作这方面的努力”（本书 p. 27）；高等教育中激烈的竞争会削弱横向多样性，同时会由于对最具声望的一所或一类高等学校的模仿行为强化纵向多样性，等等。高等教育体系变革的动力学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数量和结构发展、知识、教学与学习、控制、治理和组织等都会影响到高等教育体系的变革。整体来说，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还有一定空间，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可能完全相同，对任何一种模式神奇功能进行大肆鼓吹都是不理智的。

（四）欧洲的高等教育多样化

在本书中，泰希勒详尽论述了欧洲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政策实践。他感到欧洲对于“卓越”、“精英”和“质量”的关注加剧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冲击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洪堡理念，使教学与科研逐渐分离，实用性研究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欧洲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即秉持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因此所有的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正在受到批评，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成为欧洲高等教育多样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泰希勒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人。他支持大学排名，认为从高等教育的数量、质量、实用性和效率来看，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是有益的。他相信多元化的纵向维度比横向维度更加意义重大，在纵向的维度内，体系的顶端是至关重要的。他一方面赞成通过设置“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实现教学与研究的适当分离，以满足不同天赋才能学生的不同学习动机；另一方面，他希望维护欧洲高等教育的“洪堡传统”，对欧洲所有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他呼吁博洛尼亚进程在加剧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一体化过程的同时也能够保护高等教育体系的适度多样化。由此可见，他反对的并不是欧洲高等教

育的适度多样化，而是过于严格的纵向多样化。他认为“知识社会也许并不只要求知识的高度，同时也要求知识的广度与传播度”（本书 p. 81）。他提出了自己基于体系视角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即“在一个沟通持续虚拟化和交通便利的时代，质量不会像过去那样决定于局部卓越中心而是取决于网状布局的卓越体系的整体支持”。因此，将资源过度集中于部分“卓越大学”似乎是不可取的。

二、工作世界图景的变化：高等教育体系变革的现实效应

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给人以“象牙塔”的印象，人们想象它们遗世独立，工作世界与它们无关。随着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不断扩充，“文凭”似乎在加剧贬值，高等教育学历的市场价值开始受到各个利益相关群体越来越多的关注，高等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倾向也日益凸显。是坚守学术价值，还是主动适应工作世界的新需求？高等教育的社会意义、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问题，在欧洲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

高等教育的扩张、毕业生的增加给就业市场带来了过去不曾有过的挑战。“不当就业”、“就业不足”等问题困扰着很多国家的大学毕业生。泰希勒主张，高等教育不应仅仅着眼于让学生适应当前的工作世界需求。“鉴于就业系统需要积极的变革者，高等教育必须培养人们改变就业体系的能力”（本书 p. 44）。在社会表现出吸纳更多的大学毕业生的能力的同时，也要求高等教育能够更多地培养学生的“通用技能”，包括计算机、外语等方面的能力。反之，就会出现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脱钩、大学生就业难和雇主难以找到理想的毕业生这样的类似“过度教育”的问题。高等教育应该承担起自己的学术责任，主动适应社会和工作世界提出的新挑战，提高毕业生的“可雇佣性”。但高等教育不应该为工作世界的即时需求所左右，而是培养学生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赞成高等教育加强学生“通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实践能力等能力的培养，肯定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提高学生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作用，提倡通过高等教育体系的适度多样化来满足工作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

与此同时，伴随着扩张的进程，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二者也逐渐彼此适应：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从事先前无需大学毕业就能从事的工作的同时，他们也比其前辈更多地“创造性地工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工作内容，大幅度降低了不同工作任务及其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别。尽管并不是所有这些努力都能对职业结构产生重构性的影响，但高度发达的教育有助于工作和职业世界的更新与发展，这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因此，高等教育扩张并不必然导致“过度教育”，也不只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两者之间是动态适应的关系。更

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扩张可能因此对社会民主化作出贡献——它削弱了职业和社会的等级差别，教育程度不同的人收入差距减小将不再是说明高等教育过度扩张的指标，相反，人们会据此认为高等教育成功地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作出了贡献”（本书 p. 44）。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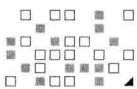
因为高等教育自产生以来就是国际性的，因此对欧洲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泰希勒教授更愿意称之为“再国际化”。

“再国际化”是各国高等教育体系深层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相对于初创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国际化已经不再是少数高等教育机构的基本特征，无论是顶尖大学还是地方性大学都具有了“全球化”特征；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性活动已经成为日常的、系统性的一项工作；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性活动不再有边界，在所有的学校决策和管理工作中，都会涉及国际性事务；国际性教育也不再局限于培养国际化的专门人才，而成为所有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的一部分（本书 pp. 81-82）。

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举措是自 1999 年开始的博洛尼亚进程。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欧洲高等教育出现了同质化的趋势。人们希望通过加强教师和学生流动、学位项目组织化、学制改革和学历互认等举措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进而提高欧洲高等教育对其他各洲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以改善欧洲高等教育落后于美国的不利局面。这既是博洛尼亚进程的重要目标，也是各界的一个“欧洲梦”。

与这种同质化进程相伴的是对欧洲高等教育多样化、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的讨论。欧洲在地理上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各个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却各具特色，因此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维度观察，欧洲高等教育体系都以其多样性为主要特色。但在泰希勒教授看来，尽管博洛尼亚进程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同质化，但这并不等于各国所有的教育政策都必须打破传统，指向同一个改革方向。在国际化时代，一个国家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是加强多样化还是加强同质化，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他主张各国高等教育体系保持适度的多样化，认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多样化不是国际化的障碍，但国家内部的多样化可能会对国际化构成障碍。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欧洲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的冲击和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所采取的措施对于高等教育的职业和社会价值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值得认真评估。

因为在博洛尼亚进程中要求所有学位培养计划中都必须包含学生就业能力



培养方面的内容，因此，“从直观的层面来看，博洛尼亚进程是有关培养计划和学位的互认体系。但是从功能的层面来看，该进程还与另外两个主题密切相关：学生流动性增加、学习与就业的相关性”（本书 p. 208）。

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其他各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有共性也有不同。欧洲当前的学生流动不同于几百年前的学生国际流动：欧洲的学生流动主要是“横向的”，这意味着交流限于或多或少有相同知识水平的伙伴间进行，而其他洲的学生流动主要是纵向的。横向流动不能高效确保实际而快速的知识转移，但它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跨国界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为合作伙伴间提供了一个“双赢环境”，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思考；此外，欧洲内部不太远的文化间的流动所产生的破坏性的文化冲击比其他任何地方可能性更小，并且迅速了解国际多样性以及学习更容易实现（本书 p. 85）。这种横向流动对学生的直接影响是在学生没有受到较大文化冲击的前提下，增进了学生对其他国家教育和文化的理解，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最终提高了其“就业能力”。这也是加强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国际流动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而且必将提高学生改造工作世界的能力，最终必然有利于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形成。

四、迈向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体系变革的终极归途

泰希勒活跃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40 多年。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出身于社会学的他就试图对高等教育体系扩张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他指出，与对一些能力或一定数量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比较起来，对“社会不平等的需求”是影响高等教育数量发展的一个更为强有力的因素（本书 p. 5）。这是因为“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现代化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组织化的资格获取与地位分配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本书 p. 5）。在社会等级相对固化时，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在相对固化的社会等级中谋取一席之地。在筛选系统逻辑的强烈驱动下，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影响力会被严重弱化，而不是增强。

学生对系统知识学习和就业的需求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张。相应地，高等教育体系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不同天赋和动机的学生的入学要求，高等教育体系因此走向多样化。国际化进程促进了学生国际流动的增加，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能力，激发了高等教育多样化和同质化的争论。高等教育体系的这些变革直接影响并改变着工作世界。大学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加，加大了人们对职业机会的竞争。劳动力市场上的求职者受教育程度差别日益缩小，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职业优势似乎也在减少，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收入和地位上的差别变小。

这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过度教育”带来的恶果，但泰希勒教授对此却很乐观。他认为，工作本身会随从业者竞争力提高而不断改变。在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者先前从事的工作中，高等教育接受者会找到方法来使用其竞争性技能，从而带来“职业的升级与改进”。虽然表面看来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生相比，其所受的高等教育并未带来明显的职业优势，但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我们应该重新考虑高度分层或者扁平的职业分层的优势与弊端：“我们是正努力向依赖于‘少数人’的‘知识型社会’前进，还是向依赖于‘多数人智慧’的‘大众化知识型社会’前进？”（本书 p. 242）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毕业生之间收入和社会地位差别变小，表明“在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各种工作之间的社会距离可能会变模糊”（本书 p. 44）。高度分层的职业金字塔倒掉了，它使很多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取社会排他性报酬的梦想破灭，但新的职业价值观却会在这一废墟中拔地而起：教育与职业的平等，乃至社会的公平比人们对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攀比更加重要。

泰希勒主张，“我们可能应该将个人的自豪感建立在我们的能力以及工作之上，而不是地位与收入的差别之上”（本书 p. 243）。知识社会不应是由顶尖知识塑造的社会。在“知识社会”里，知识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是它的“关键职业”，即教授的事情，普通人也应该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到系统的知识。在现代社会，洪堡思想已经式微，这种思想曾认为给学者提供为知识而探究真理的机会，他们的努力终将会带给社会有益的成果。因此，我们要尝试更多的方法确保理想的结果，高等教育体系适度多样化就是一个重要的方法。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变革也很重要。如果高等教育能不为工作世界的即时需求所左右，而是“有先见之明，能主动出击，让学生学会驾驭工作，应对职位变化以及自我驱动”（本书 p. ii），那么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就不是“过度教育”，而是可能因此对社会民主化作出贡献，一个“‘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能应对变化、明智行动，从而使整个工作世界和社会更加民主化——也将成为现实”（本书 p. ii）。

总之，本书内容涉及十分广泛。泰希勒对高等教育的数量和结构问题的研究不仅涉及我们熟悉的规模层次问题，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研究型大学和欧洲高等教育中的卓越、多元化和均质化问题等，也都是他探讨的问题。他不太赞同“过度教育”这种说法，也不希望高等教育机构成为工作世界的随从。他认为当前那些大学毕业生从事之前不用大学毕业就能干的工作，不仅不能算作“过度教育”，而且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推动机制。这些乐观论述令人印象深刻。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过去国际化主要是‘纵向’

现象”，当前“平等意义上的合作与流动”则迅猛发展。他预言，国际化的发展本身可能使其走向没落，同时国际化也可能需要一些新思路：“其他欧洲国家学习的专业价值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因为这样的国际经验正在逐渐失去其独特性和优势。是否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不得不采取支持进一步国际化的新行动？”（本书 p. 187）从空间看，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论述虽以欧洲为主，但随处可以看到他的国际视野。乍一看起来，泰希勒对本书三个方面主题的论述比较散，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着比较严密的逻辑关系。

在方法上，泰希勒教授每论及一个问题，通常都会将所有涉及此类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加以梳理、归类。因此他的著作显得非常具有综合性——这似乎是所有学科的大家所共有的一个特征。

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泰希勒教授从来没有就教育论教育，他有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他希望高等教育发展的目的不应该是“努力向依赖于‘少数人’的‘知识型社会’前进”，而应该是“向依赖于‘多数人智慧’的‘大众化知识型社会’前进”，最终建成一个工作世界和社会都更加民主化的“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本书 p. 242）。

在欧洲，泰希勒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三位高等教育专家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美国的伯顿·克拉克和马丁·特罗教授）。但中国的学术界对于泰希勒教授的了解似乎还远远不够。在学术期刊网上分别输入三位教授的名字，查找到的文献涉及两位美国著名教授的非常之多，而且多是对其思想的研究。涉及泰希勒教授的则多是他自己写的论文或中国学者对他论文的译文，对于其思想的研究文献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语言所致：当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言的时候，会德语的中国人还为数很少，研究高等教育且又会德语的少之又少，研究高等教育、会德语且又有时间和精力致力于泰希勒教授著作翻译的人更少之又少。这对于泰希勒教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又何尝不是中国高等教育界的遗憾呢？

作为泰希勒第一本中文著作的翻译者，我们为泰希勒在本书中展现出来的敏锐的洞察力、缜密的思维及其高等教育理论的博大精深所深深折服。我们的粗浅解读定然未能穷尽本书所想表达的所有思想。尽管如此，我们相信泰希勒教授与我们有同样的心情，那就是坚信高等教育对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深切需要，希望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真正能够成为决策的依据，相信“一个好的理论与方法会开辟出一个超出占据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主导思维的新视野”（本书 p. 252）。

希望读者视我们为同道。让我们一起不辞辛苦、坚定前行。

本书论文选编说明

第1章：专门为本书而写。

第2章：本文写于2000年，内容扩充后首次以“高等教育”为题发表于斯摩尔斯特（Smelser, N. J.）与贝尔茨（Baltes, P.）合编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Amsterdam: Elsevier, 2001）一书第6700-6705页。再次修改后收录在乌尔里希·泰希勒著的《高等教育体系》（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2007）一书第11-21页，即该书第二章。

第3章：本文写于2008年，修改后以“高等教育中的多样化问题”为题首次发表在皮特森（Petersen, P.）、贝克尔（Baker, E.）与麦格劳（McGraw, B.）合编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Oxford: Elsevier, 2010）第4卷第347-353页。

第4章：本文以1988年笔者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伊文斯顿市的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专题研讨会上发表的会议论文为基础，修改后首次以“建设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为题发表在《高等教育政策》1991年第4卷第4期第11-20页。之后又进行了修改，并作为其中的第四章，收录在乌尔里希·泰希勒著的《高等教育体系》（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2007）一书第37-54页。

第5章：本文的初稿脱胎于1998年，题目是“工作世界的要求”。笔者以此文为基础，代表国际劳工局（ILO）在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该文精简版以“高等教育政策和工作世界：变化中的环境和挑战”为题，首次发表在《高等教育政策》1999年第12卷第4期第285-312页。此文修改后收录在乌尔里希·泰希勒著的《高等教育和工作世界》（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2009）一书第49-68页，即该书第二章。

第6章：本文原稿为笔者2002年向欧洲科学院、国际教育协会与维纳·格林基金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举办的“高等教育中的卓越”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内容扩充后收入德柯尔特（de Corte, E.）编写的《全球化过程中欧洲卓越观念的变迁》（London: Portland Press, 2003）一书第33-51页。之后对此文进行了修改，并收录在乌尔里希·泰希勒著的《高等教育体系》（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2007）一书第143-160页，即该书第十二章。

第7章：初稿为2002年在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Jyväskylä University）教育研究所举办的“第八次高等教育研究暨芬兰高等教育研究者联盟成立大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欧洲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全球化”，修改后首次发表在艾朵拉（Aittola, H.）主编的《欧洲高等教育全球化》（Jyväskylän Yliopisto, 2003）一书第37-52页。

第8章：本文以笔者向国际高等教育2004年度专题研讨会“回应市场、国际化和问责的挑战”提交的论文为基础整理而成，该会议由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德国高校校长论坛与智利地区大学论坛在智利维那德马（Vina de Mar）共同举办。修改后首次以西班牙语公开发表在乌尔里希·泰希勒著的《欧洲、日本和拉丁美洲高等教育模式改革：比较分析》（Madrid and Buenos Aires: Mino y Dávila, 2006）一书第六章（题目为“比较视角下的高等教育改革：相似的挑战、不同的回应”）第183-216页。再次修订后发表在乌尔里希·泰希勒著的《高等教育体系》（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2007）一书第69-84页，即该书第六章。

第9章：原稿是在2004年任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位于日本东广岛）客座教授期间所作的一个讲座发言，修改之后以“‘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愿景与现实”为题，首次发表在《高等教育论坛》（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主办）2005年第2卷第35-54页。再次修订和精简后收录在乌尔里希·泰希勒著的《高等教育体系》（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2007）一书第161-180页，即该书第十三章。

第10章：初稿是笔者2004年为在海法市的以色列理工学院举办的国际会议“向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转型”所写的论文，后以“欧洲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观念变迁”为题发表在塔德马（Tadmor, Z.）主编的《向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转型：国际比较与国际视野》（Haifa: S. Neaman Press, 2006）一书第265-281页。修订后收录在乌尔里希·泰希勒所著的《高等教育体系》（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2007）一书第107-117页，即该书第九章。